

·体育人文社会学·

## 从《街角社会》论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的 意义和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迪

田恩庆, 仇军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 要:** 社会学经典之作《街角社会》运用参与观察法, 对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贫民区中“街角青年”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进行研究, 详细记述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调节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心理与行为、促进群体内部的凝集、强化社会地位与分层、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发挥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功能等的重要社会意义。《街角社会》一书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和边缘社群的体育运动、适当进入与融入田野并合理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体育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怀特的职业素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标杆。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街角社会; 体育运动; 社会意义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3)06-0017-06

### A stud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ports in the street corner society and its inspirations to sports sociological resear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et Corner Society

TIAN En-qing, QIU J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al sociological work, Street Corner Society studied the social activities and structure of street corner youngsters who lived in an Italian s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xpatiated on the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ports (mainly bowling) in the street corner society, in such aspects as adjusting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of social groups and individuals, promoting the internal coherence of groups, intensifying social status and stratification,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and exerting the functions of nonoffi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he book titled Street Corner Society is significant for inspiring us to focus on sports in our daily life and sports for marginal groups, to appropriately enter and blend into farm fields, and to study sports by rationall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professional makings of Whyte, the author of the book, have set a standard for sports sociological researchers.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 street corner society; sports; social significance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以下简称《街角社会》) 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的成名作, 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该书于1943年首次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sup>[1]</sup>, 随后在1955、1981和1993年又分别发行第2、第3和第4版, 被高度评价为“早在40多年前就被列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至今在美国大学里

仍被作为社会学的必读书, 并被那些从事城市实地研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视为一本研究方法方面的标准参考书”<sup>[2]</sup>, 可见这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是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值得研读的重要文献之一。

特别要提及的是, 作者在本书中通过运用参与观察法深刻描写了街角青年所酷爱的体育活动——保龄球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事件, 并记载“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等非正式社会团体组织的发展、变迁

收稿日期: 2012-09-18

作者简介: 田恩庆(1979-), 男, 土家族,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

历程。作为社会学的经典名著对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过程及其意义进行如此详实、生动的阐述,在母学科的相关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该书所记录的体育活动及其相关事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诸多启示,以期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

## 1 “街角社会”简介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威廉·福特·怀特于1936—1940年以“街角青年”的身份置身于美国波士顿市北区的“科纳维尔”<sup>①</sup>进行实地研究。对这个城市的其他人来说,该地区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一直被误认为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穷和犯罪以及进行恐怖活动的“大本营”,是一个“神秘、危险和令人忧虑的地区”。每当为了向上层阶级的人士表明下层阶级恶劣的住房条件而组织巡回视察时,这里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地区之一”<sup>[2]6-7</sup>。

在边缘社区“科纳维尔”,这里的“街角青年”基本上都是意大利移民第2代和第3代。因此,人们可以按照移民的原籍划出科纳维尔的分区。但这些界限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正在消失,同时这里生活模式也经历了深刻变化,“年轻一代已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受老年人影响较少的社会”<sup>[2]9</sup>。生活在这里的男青年分为两大部分,即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前者是处于社会底层同时构成科纳维尔男青年的大多数,他们的主要社会生活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带以及相邻的理发店、小吃店、台球房或俱乐部活动室;在1929—1933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大部分人失业或者打临工,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中间只有极少数人上完中学。而后者是一小群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地位高于前者的青年,“仍然在作向上的社会流动”<sup>[2]10</sup>。

被作者称为“街角社会”的科纳维尔大街,有着“高度的组织化、完整的社会制度”<sup>[2]7</sup>,生活在社区里的街角青年分为“小人物”和“大人物”,<sup>②</sup>并产生具有一定模式的日常行动:他们建立大大小小的帮派,加入各种非法团伙,运作俱乐部及相关的非正式组织、打保龄球和从事各种社交活动、参与赌博和政治竞选等系列的社会活动。这些“具体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一系列“具体的事”<sup>[2]11</sup>,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街角社会”,也构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学领域。

## 2 体育运动在“街角社会”中的意义

### 2.1 调节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心理与行为

体育运动具有休闲娱乐价值,能够使参与者获得

身心健康,具有增强参与者的心理平衡和调节心理、行为等作用<sup>[3]</sup>。在《街角社会》第1编第1章的第2节“保龄球的社会地位”中,详细描述了在1937年10月以多克(Doc)为首的“诺顿帮”<sup>③</sup>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sup>④</sup>之间唯一的一次保龄球比赛。由于“诺顿帮”的街角青年们均认为比“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高贵,因此非常重视这场比赛。比赛开始后,“诺顿帮”成员朝着“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选手狂呼乱叫,制造噪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sup>[2]1</sup>,最终,“诺顿帮”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作者认为,“诺顿帮”街角青年们迫切想打败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重要原因是:一方面由于社区俱乐部主任奇克·莫利(和其中的一名重要成员托尼·卡迪多)是“狂妄自大的势利小人”<sup>[2]1</sup>,这样能够让他们安分一点儿;另一方面“诺顿帮”主要是攻击这个俱乐部成员的“社会地位和抱负”<sup>[2]2</sup>,因此,当“诺顿帮”大获全胜之后,“表现出如此称心如意”<sup>[2]2</sup>。通过赢得保龄球比赛,社会地位低下的“诺顿帮”街角青年们心理得到调节,而且比赛获胜的集体荣誉感也使街角青年更加紧密联系起来。

作者还在书中描述了打保龄球时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诺顿帮”街角青年认为一名优秀的保龄球手应该比劣等球手得分多,“一球击中全部木柱却被认为是碰运气”<sup>[2]3</sup>,他们在玩球时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要想获得成功,精神上必须沉着镇静,但是在团体赛时,如果只剩下一根木柱立在那里,而且对手叫嚷“他打不中”时就会有很大压力,往往会“紧张起来而失去控制”<sup>[2]3</sup>。因此,研究一个人打保龄球的成绩时,就必须“考虑到他和他的伙伴们关系”<sup>[2]6</sup>。

在体育运动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调节方面,主要表现在“诺顿帮”的上层成员朗·约翰(Long John)身上,在1937年春天他掷骰子把每周挣的钱输个精光,但在1938年冬天就基本停止赌钱,后来他告诉作者原因,“你知道实际上是什么使我这一冬天不赌钱吗?保龄球!”<sup>[2]7</sup>当“诺顿帮”分裂以后,朗·约翰就变得无依无靠,在组织中的地位显著下降导致他连做噩梦,并且打保龄球的球艺急剧退步,在1939年春季的最后一次保龄球比赛中得了倒数第2名。而在作者的建议之下,朗·约翰被带进一个新组织的核心圈子,“在作为1939至1940年活动季节的高潮的那次个人比赛中,他得了一等奖……再也不向帮派领袖多克谈论他的噩梦了”<sup>[2]6</sup>。作者在附录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相互作用模式”,即体现群体中的地位与保龄球场上的表现以及同精神健康之间“三向关系”<sup>[2]419</sup>,因此,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相互作用的存在,使体育活动发挥了对街角社会群体和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调节功能。

## 2.2 促进群体内部的凝聚

群体的凝聚力是把群体“黏合在一起”的内在动力，是为了满足成员的情感需要，保持一致性取向<sup>[4]</sup>，一旦凝聚力消失社会群体便会趋于解体。而体育活动可以增强群体成员之间的吸引力、归属感以及对组织的向心力和忠诚度，对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在书中指出，必须围绕某种持续的社会活动才能把街角群体“组织起来”<sup>[2]433</sup>，而保龄球活动能够满足街角帮的这种需要。1937年诺顿帮获得胜利之前的街角青年是“零散地、而且常常是在其他群体中玩保龄球”<sup>[2]34</sup>，而现在这项体育运动“破天荒地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sup>[2]34</sup>。1937年的冬季到1938年春季，诺顿帮中的大部分成员每周都有好几个晚上去打保龄球，而且“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是全体打保龄球的人都在球场出现”<sup>[2]35</sup>。因此，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成为街角青年共同关注的话题和爱好，“这种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最初的群体解散很长时间以后，有些成员仍然坚持这样做”<sup>[2]37</sup>。

作者分析了这种群体凝聚的根源是由于成员们整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这种方式是稳定的，并通过长期不断的活动而固定下来，如果他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相互作用的方式”<sup>[2]346</sup>。由于街角帮内部的群体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体育活动提高了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率。正是这种互动，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和义务，成为群体黏合在一起的基础。因此，以保龄球为主的体育活动促进了街角青年之间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形成一套非正式的“互惠”机制，从而提高组织内部的凝集度。

## 2.3 强化社会地位与分层

社会分层普遍存在于社会成员或群体中，因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产生社会地位差异或层化现象，是“几乎每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都从某个方面阐释的社会现象”<sup>[5]</sup>。在街角社会中也不例外。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个人玩保龄球与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sup>[2]36</sup>。当保龄球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群体活动时，“诺顿帮”的球队渐渐按照不同路线发展。《街角社会》讲述了帮内两个不同地位的球队，即领袖多克和朗·约翰组成地位高的“一级队”和由乔·道奇、弗兰克和托米组成的地位低的“二级队”<sup>[2]36</sup>。“诺顿帮”领袖丹尼加入地位高的队并表现出色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还希望打败球技高超的另一个领袖多克。在高地位球队参加和其他街角帮以及俱乐部的对抗赛，除了上述3名球员以外还需要两名球员，但这两名球员并非来自“诺顿帮”内部，只有当这个正规球队缺人时才叫

帮内的某个随从打球，而且在这种场合下随从们“绝不会去突出自己”<sup>[2]37</sup>。

作者还总结了1937年到1938年保龄球活动季节中，社会地位和保龄球成绩之间表现出密切的联系，打保龄球成为“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sup>[2]42</sup>。当然，并非体育活动本身导致这种社会地位差异，而是背后社会结构和其他社会因素发挥了作用。正如作者怀疑的那样，假如二级队得分高于一级队，他们能否变成一级队呢？“诺顿帮”另一名领袖丹尼回答说，“假设他们真的打败了我们，而圣马科斯队的人想和我们赛球，我们就告诉他们，那帮人其实是一级队，但他们会选择和我们赛……我们这样是遵循民主的原则，但是别人不让我们搞民主。”<sup>[2]45</sup>

## 2.4 加强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街角社会中存在许多自发性社会群体，如街角帮、非法社会团体等组织形式，这些组织能够帮助实现个人目标、提供社会(交往)满意、提供沟通渠道、实施内外的行为控制等，“它能够使人们突破自身生理的局限性，获得同别人一起合作交流来实现自己目标的优越性”<sup>[6]</sup>。在该书第1章第3节描述“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sup>⑤</sup>两个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群体之间的交往，体育运动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实现组织和成员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1938年3月以前，“诺顿帮”与“阿芙罗狄蒂俱乐部”(女性为主俱乐部)并没有任何社交往来，她们认为对方俱乐部既“高贵”也很骄傲，“是在一条不同的社会轨道上运行的”，但不可能不感到她们“很吸引人”<sup>[2]46</sup>。有好几个星期，这两个群体的成员几乎每天晚上见面，打保龄球、玩牌成为主要的娱乐活动，以及后来外出郊游，这些交流给“诺顿帮”的社交生活带来重大变化，亚力克(Alec)认为“以前我们认为她们盛气凌人，我猜想她们把我们当成一帮无赖……现在我认为她们喜欢我们，我们正式取代了社区俱乐部的地位。”<sup>[2]47</sup>

但是，组织之间的交流的最终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反而“与姑娘们一起打保龄球有可能使诺顿帮分裂，于是丹尼和迈克向多克施加影响，以重建群体的团结”<sup>[2]58</sup>，虽然最终有两个街角青年乔(Joe)和弗雷德与这个群体中的成员结了婚，但后来大部分人和该俱乐部的女孩子逐渐疏远。最后作者指出，与姑娘的交往和打保龄球一样也是“获得、保持或失去在群体中声望的一种手段”<sup>[2]58</sup>。

## 2.5 发挥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功能

非正式组织是以成员的心理包括动机、观点、信仰、爱好、情感一致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无形联合体<sup>[7]</sup>，它无正式结构，常常不能自觉认识到共同目的，

而是以内部成员的互动而产生,并由此确立共同的态度、习惯和规范。非正式组织具有信息交流、对协作意愿的调节而维持正式组织内部团结、维护个人品德和自尊心等功能<sup>[8]</sup>。由于社会成员的兴趣、利益、感情目标需求的不同,便形成不同类型和规模的非正式组织群体,因此,人们对体育活动爱好或者相关利益的需要也自发形成各种非正式的体育组织。

在《街角社会》一书第5章中主要讲述了“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这一非正式体育组织的成立、运行和分裂。首先是“理发店帮”<sup>⑥</sup>提议大家租房办一个俱乐部,并制定章程,成立以赛狗和纸牌赌博为主要活动的“社交与体育俱乐部”,除了通过收取会费和管理费的方式筹备经费以外,还在俱乐部里做起卖啤酒和饮料的生意。这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当下中国街头巷尾流行的“棋牌室”经营模式。因俱乐部开张,街角青年有机会更加紧密接触,也加大了街角青年“对非法团伙成员的依赖”<sup>[2]212</sup>。而且,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为了使全体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sup>[2]213</sup>发生了俱乐部改组事件,最后在卡洛的主导下达成协议。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诞生和发展,体现了街角青年们希望通过非正式组织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本并寻求归属感和社会认同的集体行动。在对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活动和结构进行考察后,作者认为街角中这类性质的小团体“适合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下层,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差异。”<sup>[2]356</sup>作者指出这个地区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是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结构融为一体。”<sup>[2]357</sup>

### 3 《街角社会》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 3.1 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体育和边缘社群的体育运动

许多社会学理论抽象、晦涩难懂,诸如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一样<sup>[9]</sup>,而人类学研究中如林德夫妇的《中镇》、卡罗琳·韦尔的《格林威治村》等也只是从社会问题层面研究社区,缺乏对社区组织系统的研究<sup>[2]372</sup>,其研究的基本特点都是看不到具体的人。但《街角社会》“就美国社区生活这个一向十分重要的主题提供了新资料,并从人的角度生动展示”<sup>[2]452</sup>。作者形容自己的研究是拍摄一部活动的电影,“贫民区只是一个地区,那里高度集中了低收入的人,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屋里,卫生和健康条件恶劣……我认为确定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生活是一个从实际观察中提出的问题。”<sup>[2]450</sup>怀特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是仅仅因打保龄球而打保龄球,而是“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材料。”<sup>[2]410</sup>因此,《街角社会》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转换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社群的关注是体育社会学和研究者的应有之义。由于在当前我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出许多生活设施破旧的居住区,例如,在“城乡结合部”的某些地方就具有“街角社会”的部分特点,存在诸如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生活集中于某些街角地带以及相邻的理发店、小吃店、台球房或俱乐部活动室”<sup>[2]110</sup>青年群体,而这一群体一直受到社会的漠视和边缘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见<sup>[10]</sup>。生活在这些边缘社会中的青年们追求时尚,酷爱通过台球、极限体育运动、网络游戏等方式寻求刺激和标新立异,所以研究他们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归主流社会,获得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提高社会地位等具有现实意义。

#### 3.2 适当融入田野、合理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体育

研究中作者创造性地引入人类学研究方法,即参与观察法。作者通过亲身实践认为:深入“街角社会”最重要的是学会像街角青年那样待人接物,“学着参加街角对棒球和男女关系的议论”<sup>[2]390</sup>,而且明确自己只有在街角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后,用不着费很大的力气就可以获取相关研究资料。1937年的春天在“诺顿帮”对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保龄球比赛上,作者只能静坐旁观努力做到没有偏向为两个队喝彩;但是,最终标志“街角青年”接受作者是迈克·乔瓦尼组织的那场棒球赛,作者作为正式队员参加比赛,在“诺顿帮”领袖们的信任下打出了关键得分,“当他们指望我成功的时候,我能击中,仍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而这也更进一步使我觉得自己是诺顿街的人了”<sup>[2]396</sup>。而且,在融入街角青年群体的过程中,作者理解到“我和这些人打保龄球,是为了确立一种社会地位,以便能与他们交谈和观察到重要情况。”<sup>[2]410</sup>

同时,《街角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学术贡献,在于它的成书过程和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由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将人和人的活动还原为抽象变量,强调在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应当排斥主观评价,立足于纯客观化的社会现象<sup>[11]</sup>,与之相反的是人类学家格尔茨所主张对社会文化“重构一种可以理解的解释”方法<sup>[12]</sup>,怀特却试图在这种实证主义和文化阐释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在本书附录中详细展示了“参与观察法”的形成、运用及其反思。作者认为运用该方法的个案研究能够发现其中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可以在其他个案中从试验中或数量上进一步得到检验。因此,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需运用这类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并非只有“统计学才是通向科学的唯一途径”<sup>[2]465</sup>。首先,作为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常常发生角色转换的矛盾,“为了进行这项

研究我必须使自己成为一名参与观察者”<sup>[241]</sup>，起初作者是一名“非参与的观察者”，但后来融入社区又差点儿成为“非观察的参与者”<sup>[241]</sup>，因此，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作者敏锐地感知被研究者的各种信息，并做出十分翔实记录，在离开研究地区和对象后，又回归研究者的身份，对收集的庞杂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及时做出总结。而且，还需要对自己研究伦理道德上的一些失误进行反思，“参与观察者单纯为了加强自己在参与某一领域中的地位，而努力想操纵被观察者，并不惜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这对于被观察者来说是不公平的。”<sup>[2428]</sup>这种做法非但不明智，而且违背了职业道德。还要保持研究者的独立性，“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迎合这个地区的人，还必须保持自尊心。”<sup>[2407]</sup>

怀特对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为社会学的发展创造了宝贵财富，对今天的实地社会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sup>[13]</sup>，而当前已涌现出大量的文献对“参与观察法”的运用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和讨论，并形成了方法论体系<sup>[14-16]</sup>。在人们仍然对定量研究顶礼膜拜之际，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仍有研究者已经深刻认识到数理统计方法存在的重大局限，提出了诸如“难道体育科研中数理统计方法取代了定性推理吗？如何避免数理统计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呢？”等相关主题的讨论<sup>[17]</sup>。而且，定性研究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sup>[18]</sup>，其中参与观察法是一种“以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收集数据的民族志定性研究方法”来发现体育运动中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微观特征并揭示其中的意义<sup>[19]</sup>。

### 3.3 怀特的职业素养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标杆

第一，必需具有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当怀特在开始研究街角社会之际，就有一种“想为建立一门社会的科学做出贡献——而且至今我仍然未放弃这一执着的追求”<sup>[2463]</sup>正是这种雄心壮志，才使他坚持不懈，最终让自己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的经典。第二，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作者指出，当人们进行一项研究时，要从研究对象的各成分之间假设的关系模式中找出逻辑，那么“研究者就必须不仅仅选择单纯的报告和描述，要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性。”<sup>[2467]</sup>作者将这种创新精神彻底应用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例如，他把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理论“很早拿来用于实地研究”<sup>[2373]</sup>。而在学术界，仿佛已经秘密商定对实地工作的亲身经历闭口不谈，“我们找不到任何揭示一个实地工作者必然经历的错位、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卷进去的真实说明”，于是作者决定“填补这一空白尽自己的菲薄之力”<sup>[2453]</sup>。第三，具备强烈的

反思精神。在《街角社会》成书若干年后，作者对成书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反思，这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首开先河。尽管在此之前人类学领域中有英国的格雷戈里·贝特森<sup>[20]</sup>将这种社会实验操作过程直观展现，但怀特展示则更加突出研究者对研究方法方面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人类学越来越公开转向内省，才涌现出像保罗·拉比诺、奈吉尔·巴利等人类学家，直接关于田野工作过程为反思对象的优秀人类学作品。

当查阅相关文献后可能会发现对体育社会学意义的陈述大同小异，抽象、宏大的论述可能会让读者难以理解。而当前在我国正为“金牌”价值争论不休、因青少年体质下降而困惑不解、对社区体育发展忧虑重重之际，我们为何不静下心来，打开这本出版近70年的社会学经典名著，去欣赏书中给我们呈现出的一幅幅生动而细腻的生活图景，仔细体会体育运动所具有鲜活的社会意义呢？也许当我们完整、深入地阅读完这本经典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需要转换思维，反思过去已做过的研究，审视正在进行的课题，重新规划即将着手的研究方案。

而且，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到研究者的朴实与真诚，感受到他治学的严谨与自信，以及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和反思精神。反观当下社会，浮躁、浅薄和急功近利，“抽象经验主义”把社会科学研究定位于数据分析和统计软件使用，僵化的官僚体制严重束缚研究者的自由，研究成果表现出简单化、时政化、重复化等特征<sup>[21]</sup>。

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不仅仅需要有宏观、抽象的理论思考，还需要走出书斋、走进社会，以“来自街角的眼光”深刻而精致地去揭示人们日常生活和边缘社群中体育活动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隐藏背后的社会机制。唯有每个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者充分把握、完整理解了体育活动所具有的各种层面的社会意义，并努力具备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以充满智慧的心智品质去承担解释、说明人类处境，担当启迪他人觉醒之责，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历程，去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关注社会底层和“沉默的大多数”<sup>[22]</sup>，拥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反思和探索我国社会转型中体育的发展之道，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才会卓尔不凡，学术品位和学科地位才会得到提升，理论成果才有可能真正服务于大众！

本文得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专题——定性研究”课程讨论中的指点，特此致谢！

**注释:**

- ① 在社会学研究中的真实地名和被调查者的姓名一般会被隐去,或使用化名(真实姓名的使用需要征求本人同意),因此,书中的“东城”的中心地带——“科纳维尔”实际上是波士顿北区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区,且书中所有的人名均为化名。
- ② “小人物”是指“诺顿帮”以及其他帮派和俱乐部的成员,“大人物”是指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
- ③ 活动在诺顿街按照孩子们年龄划分形成不同的帮,以多克为首的一帮人称为“诺顿帮”,帮中的高层如多克、迈克、丹尼和郎·约翰被称为“领袖”,而弗兰克、亚力克等作为地位较低成员被称为“随从者”。
- ④ 在街角一带被称为“男青年会”,是由男大学生组成,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组织,每隔两周在诺顿街文教会馆有一次聚会。
- ⑤ 由12名漂亮的意大利年轻女孩组成,其社会等级低于“意大利女青年会”。
- ⑥ “理发店帮”是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前身,因以该帮创始人卡洛·泰代斯科和他的亲密朋友经常呆在一个名叫乔·帕莱尔莫中年理发师的店里而得名。
- ⑦ 一种意大利式保龄球,主要流行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以及居住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的意大利裔移民中间。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Foote Whyte.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3.
- [2] 威廉·富特·怀特. 街角社会: 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 黄育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 J·塞缪尔·约翰逊. 体育运动与心理调节[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84(2): 105-108.
- [4] Carron A V, Bray S R, Eys M A. Team cohesion and team success in sport[J].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2002, 20(2): 119-126.
- [5] 李强. 社会分层十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6.
- [6] 丹尼尔·A·雷恩. 管理思想的演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5.
- [7] 戴维·布坎南, 安德杰·赫钦斯盖, 李丽, 等. 组织行为学[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476-477.
- [8] 巴纳德. 经理人的职能[M]. 孙耀君,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9]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5-49.
- [10] 马德峰, 李梅. 街角青年: 来自苏北小镇的观察与访谈[J]. 中国青年研究, 2002(5): 42.
- [11] 张小山. 实证主义社会学面临挑战[J]. 社会学研究, 1991(5): 114-126.
- [1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38.
- [13] 赵铁. 《街角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J]. 学术论坛, 1999(4): 114.
- [14] Lynne Hume, Jane Mulcock. Anthropologists in the field: cas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M]. Chi Chest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5] James P Spradle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M].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 [16] Alpaslan, Ozerdem, Richard Bow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development and post-disaster conflict reconstruction[M]. Farnham, Burlington, VT: Ash gate, 2010.
- [17] Mike McNamee.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of Exercise, Health and Sport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methods[M]. New York:Routledge, 2005: 117-132.
- [18] David L Andrews, Daniel S Mason, Michael L Silk. Qualitative methods in sports studies[M]. New York: Berg, 2005.
- [19] Chris Gratton, Ian Jones. Research methods for sports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0: 175-184.
- [20] Gregory Bateson. Naven, a survey of the problems suggested by a composite picture of the culture of a New Guinea tribe drawn from three points of view[M].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21] 仇军. 西方体育社会[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410-419.
- [22] 郭于华. 清华社会学评论: 面向转型社会的民族志[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0.